

陈舒劼◎著

价值的 焦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述

安徽人民出版社

张其成讲读

价值的焦虑

张其成讲读

张其成讲读

陈舒劼◎著

价值的焦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述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娟

装帧设计:宋文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价值的焦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述/
陈舒劼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212-03699-7

I. 价… II. 陈… III. ①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②知识分子—
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7.42 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0596 号

**价值的焦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述**

陈舒劼 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 编:230071

发 行 部:0551-3533258 3533292(传真)

照 排: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芳翔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9×1194 1/32 印张:8 字数:240 千

版 次: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3699-7

定 价:2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001	导 论
003	第一节 现代性语境的生长与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演变
015	第二节 道统与政统之间：当代知识分子的传统遗产
028	第三节 阶级性、批判性、公共性：当代知识分子的 域外参照
053	第四节 “中间物”与“实践性”：“知识分子”定义的一种抽象
061	第一章 革命：神性的召唤
063	第一节 必然与欢欣：知识分子的革命情愫
074	第二节 革命的神性与知识分子的献祭
090	第三节 革命历史叙事中的话语形态
101	第二章 极权：文学的想象与忧思
103	第一节 从知识体系到道德人格：“异化”的行进路线

CONTENTS

114	第二节 从犬儒到虐恋:反抗“异化”的可能性想象
129	第三章 信仰:皈依的迷途
131	第一节 苦难与人道的畸变
144	第二节 理性与诗学的无力
159	第四章 情爱:纵欲的缘由与失落
161	第一节 知识的资本化与性别间的权力关系
175	第二节 放纵、错位与责任的缺失:情爱意义的探寻
189	第五章 道德:良知的传统与限度
191	第一节 旧影与新质:市场时代的道德话语
204	第二节 知识分子形象的处置:道德话语的模式与破绽
219	附录 启蒙: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公共建构
235	参考文献
251	后 记

导 论



第一节

现代性语境的生长与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演变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于 1872 年《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所发之感叹,在其后的百余年间被反复提起。若按“方生方死乃是大时代”的看法,从 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百五十年间俱可称为变动不安的“大时代”。随着两次鸦片战争、1883 年中法战争、1894 年中日甲午之战以及 1900 年八国联合侵华战争等接踵而至的失败,民族、国家、社会陷入整体性危机。这使得保持了两千余年的传统文化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随着传统文化阐释力的急速下降,民族心理中的“断代感”不断地增强,相比于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帝制传统所带来的循环感,近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显现出它强劲的线性指向。无论这种历史进程被描述为何种意义上的“现代性”,或是被归因于“现代性”的哪些特质,这都是个激进而亢奋的探索阶段。洋务、变法、新文化、革命、跃进等词汇标志着某种理论的想象以及实践,它们允诺短时期内对当时中国社会主要问题的解决或有效缓解。也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期望以及实践后更强烈的失落感的反复交织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呈现出另一种意义上的“断代感”。“发展”与“稳定”在此时期成为新的时代路标,这意味着温和渐进的“改良”将替代激进决绝的“革命”,社会的结构、层级不再受到整体性或强制性的扭转,生活本身的需要压倒某种意识形态蓝图的构想——“经济”正在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替代的新核心。经济的发展有效地不断刺激着资本实现自我复制和扩张,社会运行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为怎样掌控经济的良性增长,并将这种增长转化为尽可能的分配公正与社会和谐。

在此进程中,一百多年以来对家国存亡、民族前景的焦虑,相当程度上已经在社会的整体观念中被逐渐稀释、淡化,许多来自于不同社会层级和不同社会身份的声音表明,这新时代的开启在总体上值得乐观并且的确溢出某种幸福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彷徨百余年之后,似乎可以走向一个“感叹的终结”。

然而从另一个视角来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包含的问题意识与危机感却远未趋于终结——毋宁说它正以新的结构、新的方式、新的面貌和新的途径不断地生成、繁衍,这种视角的主体就是“知识分子”。上到中国近代民族家国危机诞生,下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思想观念、知识结构、身份功能、群体实践等等经历了全方位的变更和重组,其幅度之大、程度之深,并非“从‘士’到‘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观所能全部概括。此一百五十余年中,知识分子始终扮演着重要的历史角色,除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约三十年间作为反面政治符号而无所作为之外,中国知识分子总是以不同的身份角色左右着历史进展的方向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兴衰。自鸦片战争的硝烟从南中国的洋面上飘向内陆,域外的思想伦理就伴随着异邦的军火器物由当时的士人如魏源等引入中国。某种程度上,正是古代士人对时局的敏感及其社会责任感,使他们点燃了中国现代性的导火索,并最终使知识分子群体自身也伴随现代性的生长而发生质变。当时的知识分子即士大夫们不仅提出并试行了从器物到制度的系列针对外患的构想,更为重要的是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儒家知识分子出身的朝之重臣在清帝国的肌体已接近衰竭的情况下仍然完成戡乱重任,避免了更深重的民族国家危机的爆发。在这些朝臣和地方督抚的努力之下,清王朝甚至出现了回光返照式的“同治中兴”。但从根本上说,儒家观念体系出身的士大夫难以跨出自身的观念系统并全面应对近代中国的危机,格里德尔在其《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中就对李鸿章深表“历史之同情”：“他从内心深处发现或者感觉到了变革的不可避免,但他

既不能在事物的传统框架中为变革让出位置,又无法使自己超越那个仍然视传统为神圣的思想境界。这是古老帝制灭亡之前最后几十年间不知所措的儒学思想家们面临的困境,是一个他们无法回避的问题。”^①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所载,直至李鸿章临终前一小时,仍有俄国公使立于床前“促画押”,李死前“未尝口及家事”,所挂念的仍然是两宫安危与和约协商。李鸿章对儒家知识分子信念及其实践的诠释,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晚年的无奈与悲凉也正是当时身为“社稷栋梁”的知识分子群体处境的缩影。

面对危机的逼迫,传统知识分子所恪守的儒家学说越来越暴露出它的无能为力,此外,知识分子群体进入权力体系的培养与选拔机制也遭遇到深刻的危机。1905年,绵延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正式落幕,这是传统的“士”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转化的核心事件。有学者将此前后的知识分子历史演变概括为“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社会权势中心的位移。^②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体的衰亡,使得“在朝为官,在乡为绅”的古代知识分子作为体制与社会之栋梁的地位随之消亡。伴随着西学登陆和社会现代性的不平衡发展,知识分子群体也逐渐由单纯的人文社会科学属性发展为文、理、农、工、商等多学科属性。在此过程中,身处转型期的近代知识分子于军人集团和商人群体兴起的同时,继续探索属于“大时代”所

① [美]杰罗姆·B.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② 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见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对此描述易晖有不同看法,他以为罗志田对知识分子边缘化的描述和分析不足以支撑其判断,他倾向于使用“分化”一词来描述晚清以后、1949年以前的知识阶层面貌。(易晖:《“我”是谁——新时期小说中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但无论是“边缘化”还是“分化”,知识分子群体从传统社会结构中心的撤离都是不争之事实。

特有的强国新民道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等最后一代“士大夫”虽然受过良好旧学教育,持有传统功名,却重视并促进了域外科学体系和文化伦理在中国的推广。在他们之后,鲁迅、周作人、胡适、陈独秀等后一代的知识分子构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形象的轴心,尤其是鲁迅、周作人和胡适这三人,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身处“方生方死”大时代中的文化精英类型。他们的价值立场、价值判断、思维方式以及人生姿态大多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中不能轻易绕过的“原点”式问题,其中充满了矛盾甚至是难以破解的悖论。鲁迅的“一旦开口便觉空虚”、“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周作人的“半儒半释”、“流氓鬼与绅士鬼”,胡适的“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①,都显露出他们各异的人生哲学中深存的悖论。然而这一代知识精英仍然保持了强烈的“用世”心态,无论取何立场或姿态,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知识精英对世道时局的认知和作为,在他们身上,传统士大夫的责任意识和西学知识带来的新视野观念相互混合。虽然科举制的废除在社会结构上取消了读书人的中心地位,然而周氏兄弟及胡适这代知识分子却开创出现代文化思想的轴心时代。

在他们之后,被殷海光称为“后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则更多像分工明确的知识专家。^②虽然冯友兰、贺麟、傅斯年、罗隆基、顾颉刚、潘光旦、费孝通、朱自清等这批知识分子在学术上的成果颇为可观,但他们中相当部分人出于各种原因而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政治实践,当时的民国政府的中高层聚集了许多知识精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政治力量的改变和意识形态的更

① 蒋介石挽胡适联。此对联在对胡适的整体把握上是很准确的。

② 关于近现代知识分子代际的划分,可参考许纪霖《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见其《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也可以参考王岳川在其《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中对知识分子分代问题及思想命运的讨论,但这些划分大同小异,对近现代知识分子思想类型等问题的讨论影响甚微。

新,工农文化水准成为时代的新标高,被官方立场所接纳的知识分子也大多仅受过战争时期被改写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诸如《联共(布)党史》类的教材以及中共领导人的政治书籍影响极为广泛,意识形态的灌输基本上取代了独立思想的权力。五十年代后的二十余年,全国规模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此起彼伏,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都未能幸免,文艺界尤重。1950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年批判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1954年展开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同年对不肯回归大陆的胡适展开了政治学、哲学、史学、教育学等领域的全方位批判,1955年胡风及其追随者被视为“反革命集团”,两年后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案也拉开序幕。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之后,杨献珍、翦伯赞、周谷城、邵荃麟、罗尔纲、孙冶方等分属各不同领域的学者也遭受批判。^①“文革”十年对知识分子而言“似将海水添宫漏”,漫长的敌视与批判扭曲了学术的正常表达和知识群体的人格操守,知识群体成为政治上最负面的价值符号之一。八十年代后治国方略的改变使思潮得以重新进入封闭已久的大陆,新启蒙的理想在多学科知识视野开拓的平台之上重新升起,以文化批判带动现实批判的潜流在涌动,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启蒙情结在时松时紧的政治氛围内逐步苏醒,文学充当着某种意义上的先锋。但启蒙的整体努力最终由于学界自身的浮躁、商业氛围的侵蚀等诸多复杂因素的合力作用而消散,身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发现,知识分子轴心的时代的确不再复返。他们所面对的时代语境、知识体系、话语类型仍然类似于1840年以来的那种迅速变幻——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群在历史上找不到可以借鉴的解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一种新的“现代性”的问题集群的方式复现,这也是本书研究对象所置身的历史语境。

① 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9页。

“现代性”显然是个异常复杂而庞大的问题群落,它包孕着许多悖论和冲突。这个产生于欧陆的概念意味着线性而非循环的时间观,哈贝马斯就从这种时间观中推演出一套理想的方案,它包括发展客观的科学、普遍的道德和法律,具有内在逻辑的自主性艺术,但现代性的历史过程实际上扭曲了这种理想的状态。吉登斯的界定很简洁——现代性大略等于工业化世界的社会关系。鲍曼的看法与吉登斯差不多:“现代性首先表现为一个确定性的时代……现代,准确地说,就意味着理性管理,高度的、迅速发展的生产力,以及科学为基础的世界,它最终将产生出能够普遍化的社会组织模式。”与上述学者视角不同,利奥塔则将现代性视为一种势必要瓦解的宏大叙事,福柯又认为现代性是某种将自身与时代相关联的态度。^①因此,“现代性”的定义很难导向一个稳定的公式化的定理。法国学者瓦岱在进行其总题为“文学与现代性”的演讲时,开门见山地指出:“含义最丰富的概念往往也是最不容易定义的概念。这些概念的使用范围涉及不同的领域,它们在不同情境中所表达的意思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现代性’这个词就属于这种情况。它悄然出现在19世纪,如今已成为文学和审美批评言论,以及历史、社会学、经济、政治直至广告术语中的一个关键词。它所具有的不同价值取向,既可以使其成为一种宣传性的口号,也可以使其成为一种有利于传统的反衬物。”^②因此,中国“现代性”语境的全面生成,必然要在“将‘现代性’视为充满自身的差异性、矛盾性和内在冲突的总体概念”的前提下,才能得以论述。霍尔对现代性的基本判断有四个要素:政治层面的

① 参见汪晖:《现代性问题答问》,《死火重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页。[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165页。

② [法]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田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世俗政体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经济层面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积累、社会层面的劳动和性别分工的形成、文化层面的世俗物质文化的兴起。^① 将这些要素相对应地转化为中国语境内的表述,就是现代民族国家政权的稳定、全盘计划经济政策的逐步废除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社会分层的进一步细化、物质文化的兴起。据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总体上是一个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新阶段^②,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的现代性呈现出愈加复杂的质素,它既呈现出“共时性”的挤压,即局部地区内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因素的同时存在,也呈现出现代化过程中明显的地区差别:由西至东,现代性因素成阶梯状升高。无论身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是二十一世纪之后的回望,九十年代都常被视为某种时代的开端。在此语境内,许多著述从不同的侧面进入了各自的论题。就与本论题相关的著述来看,陶东风在其系统讨论当代知识分

① 参见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页。

②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显然仅是现代化的重要时段而非起始时段。中国“现代性”的源起同样是个难以厘清的问题,大体上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可以作为一个明显的界标,即将中国现代性的起源归结为被动式的反应。但从其他各个角度考虑,这一界标也并非不可商榷。若从时空观念上看,自明末西方传教士将基督教带进中国后,西方的天文学对中国传统的时空观就造成了巨大冲击(郑家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起源语境》,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语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若从市场经济和近代文化观念的发展状况看,1840年也是个明显被滞后的界标。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大多停留于零散、局部和脆弱的状态,即便是在民国时期有所谓的“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但陷于连绵战火中的国家政权又根本不足以保证大范围内市场体系的建成和正常运转。“文革”结束后所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可以看成是现代性实践的信号,但整个八十年代执政团体中对此尚不时产生摇摆,并与其他的社会意识群落存在观念上的分歧,直至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才最终于意识形态上统一并强化了“现代化”的实践认同。因此,政权意识形态、经济形态、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形态等方面较为全面的中国现代性进程,无疑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本书在承认“现代性”自有的复杂矛盾的情况下,认同“九十年代”为中国现代性“新阶段”的开始,是对本书论述语境的技术性简化,也为避免陷入无关的九十年代属“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论证。

子与社会转型的论著中就强调九十年代的独特性：“90年代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时代的特点之一，是社会同质性的消解。在过去计划模式的社会里，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呈现一种高度同质的整合关系……计划经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一元主义的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无疑是高度协调的，可以相互支持、相互解释，非常‘配套’。而到了90年代，三者之间的这种同质整合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了……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内部也呈现分裂、多元的状态与异质化的倾向，出现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多种政治因素的并存，以及多种文化价值取向并存的局面。”^①

社会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带来的社会结构层次的重组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社会学学者孙立平认为，在九十年代以来以“断裂”与“失衡”为特征的社会中，“知识分子”这个名词的使用频率在逐渐减少，“因为知识分子本身已经高度分化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和没有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甚至他们的内部还在更进一步的分化”^②。王岳川所作的描述则侧重于某种知识“更新换代”与“转向”的仓促感，“90年代的中国承接本世纪的多种社会思想转化，发生了全面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但“转型”导致的文化的“主义”形态迅速交替和文化贬值却让知识分子尴尬不已。^③许纪霖的论述更像是对前二者的总结与深化：“1989年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分水岭。90年代以后，由于外在环境和知识结构的变化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挑战与80年代有很大的区别”。“90年代与80年代在知识方式上的区别是，80年代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和意

① 陶东风：《多元与沟通（代前言）——关于当代文化与知识分子问题的对话》，《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2页。

② 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③ 参见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引言、第一章、第三章。

意识形态的分歧,但这些分歧者背后的知识背景、思想预设和价值倾向基本是一致的,背后还存在共同的思想平台,那就是所谓的启蒙话语。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这个同一性已经不存在了,统一的思想平台完全解体,不再有为所有人一致认可的元话语,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各样越来越不可通约的共同体话语……在知识话语上,一个统一的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已经荡然无存了。”^①这不禁令人联想起九十年代爆发的那场著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许多学者在对这一描述的认同之上表达不同的担忧、阐释或批判。许纪霖描述的九十年代之后话语的“个体化”与利奥塔在与“元叙事”相对的意义上使用的“小叙事”颇为相似,但从知识分子社会功能的变迁来看,更近于鲍曼所说的从“立法者”向“阐释者”的身份位移。鲍曼曾借此隐喻知识分子功能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变,但他同时强调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联:后现代性的来临并没有完全取代知识分子实践的现代性模式,前者也没有驳倒后者的有效性。^②

回到中国的语境中,知识分子话语的个体化,似乎更应当被视为现代知识分子面对身处其中的社会转型以及转型过程中各种问题迸发所采取的某种更为理性的思考方式。汪晖在肯定九十年代断代性的意义上进一步推进知识分子思想状况与其所处的现代性语境之关系的考察,《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的开篇即点出:“1989,一个历史性的界标。”汪晖认为,与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考密切相关的有三个前提语境:一是1989年的事件没有改变中国自70年代末期以来的改革路线,改革的步伐较之80年代最为开放的时期更为激进,中国日益深入世界市场的竞争之中。二是知识的生产和学术性的活动已经成为全球化过程的一个

①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4页,第18页。

② 参见〔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导论第8页。